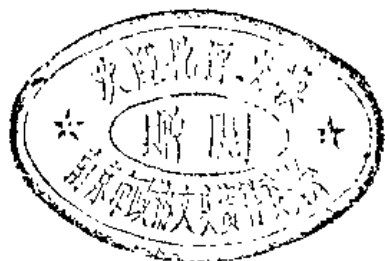


史料选编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录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给我的启示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陶德珉(遗稿)(1)

宗仰上人与孙中山先生.....杨霞受戒弟子雪烦(21)

少年时代对中山先生的难忘记忆.....王芷湘(24)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中的吴兆麟

.....吴祖芬 吴祖芳 吴景明(28)

访茅乃封谈辛亥光复南京.....朱子爽(48)

我参加辛亥革命攻守战役的回忆

.....朱 澍口述 朱 澍执笔(60)

陈海涛与辛亥革命.....陈楚南(62)

关于《辛亥革命资料》第四九七页《樗公随笔》等史料

的订正.....陶德珉(遗稿)(69)

胡瑛参加辛亥革命前后若干事略.....胡 洁(遗卿)(74)

万年遗臭说张勋.....廖宇阳(81)

南京“四·一”惨案和我父陈祝三被害经过

.....陈兴祥(89)

在淮海战役中参加贾汪起义的回忆·····	吴宪昌 (94)
悼念邓演达同志·····	张含清 (100)
缅怀邓演达烈士·····	邓昊明 (110)
陶行知先生关于幼儿教育的遗产	
——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九十诞辰	
·····	戴自俺 (122)
记爱国侨领陈嘉庚在家乡办学二三事·····	陈 斌 (150)
南京李顺昌服装店	
·····	王淑华口述 彭如清整理 (155)
中统局所谓“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	
——汪蒋合流之一例·····	张 文(国栋) (168)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给我的启示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陶德琨(遗稿)

前 言

我年届八五，老眼昏花，手腕不灵，每欲执笔写作，总有力不从心之感。欣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又忝居南京纪念分会筹备委员之列，不得不振作精神，写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给我的启示，同时概述中山先生倡导革命，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的丰功伟业。我在清末末年，留学美国，多次在海外与中山先生聚会，回国后于辛亥武昌首义时，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继又转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中，随侍先生，纵谈国事。现就回想所及，叙述历史经过。惟以时隔多年，记忆不周，错漏难免，至希识者补充指正。

一、纽约初会

一九〇四年底到一九〇五年初，孙中山先生与我和我的同学朱功甫、孙裕方一同旅居在美国纽约市的一个老太婆家中三个星期。我和朱功甫是一九〇二年十一月由满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经心书院派往美国留学的两名“高材生”。孙裕方则

，先生……
先生代租一间民房，作我们假期旅居之用。在我们到纽约住进该屋之次日，房东老太婆将一封邮递之 Dr. Y. S. Sun 的信件送入我们房中，孙裕方同学接到该函时，当即向老太婆说：“我姓孙，我的信应该是 Mr. Y. F. Sun，这一封 Dr. Y. S. Sun 的信不是我的。”房东老太婆随即向我们说：“三层楼上还住了一位你们中国人，他也姓孙。这封信必定是他的。”嗣经我们询问明白后，知道住在三楼姓孙的就是我们早已闻知的大名鼎鼎的兴中会领袖孙文（号逸仙）先生。信是他的。先生上下楼时必须经过我们的房门口。当先生得知我们都是中国留学生，就和我们开始亲切交谈。

我们旅居时，每日三餐，都到饭馆去吃饭。有一天，我们上街吃早饭，不料街上各饭铺都大门紧闭，不接待客人。孙先生告诉我们，这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五日，是圣诞节，美国全国都停止工作，放假庆祝，其隆重胜过中国的春节。说完后，叫我们一道上唐人街中国饭馆去吃饭。从此，先生和我们遂日益熟悉，我们几乎无事不向先生请教。

纽约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群楼高耸，万商云集，熙来攘往，行人众多。在火车与隧道车的站台上，每天总有好几万人上下，我们初见这种景象，如堕五里雾中，方向莫辨。先生就自动热心为我们作向导，不惮烦地带领我们游览市内若干名胜地方。我们追随先生左右，且走且谈，游兴甚浓，不知我倦。先生态度和蔼，诚恳耐心，乐于为我们解释问题。该时，先生年甫三十八岁，嘴上已留有胡子。虽然长于我们十几岁；其

先生似亦认为我们都是可以团结的有为青年同志，所以在交游的三个星期中，同我们谈话的范围，逐渐广泛而深入，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

当时日本正与帝俄打仗，先生向我们谈论世界大势及日俄战争的情形时说，“日本与帝俄都强占我国东北的疆土，在我国境内打仗。这个战争根源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力维护国家的主权，致使其土地被邻国争夺，不仅不能出兵抗敌，反而采取所谓‘局外中立’政策，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制人民。尤其是西太后那拉氏擅自专权。实行‘宁送友邦，勿予汉奴’的反动政策，听任列强在中国境内划分势力范围。全国有识之士，眼看大好河山将沦为殖民地，莫不义愤填膺。以我们旅居纽约的华侨来说，昔年美国修建贯通东西大陆的铁路，开发太平洋沿岸各州时，曾经招募广东华侨数十万人，为他们卖力。迨铁路建成之后，为便利欧洲移民入境，合众国上下两院议决，又严禁华工入境。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博士在该国国会公使旁听席上愤怒发言，痛斥禁止华工入境的决议，但无结果。我们必须发奋图强，把振兴中华的责任担负起来，将满清皇朝推翻，改成为中华民国，自不难于数十年内将此贫弱的中国建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先生多次向我们畅谈世界大势，并分析革新中国的若干问题。他指出：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死心塌地倡言保皇立宪，延长满清政权的寿命，就等于延长国民的痛楚。说：“真正拯救中国的方法在于革命。但是，革命事业重在实际行动，有了正确

的方针，还要有充分的准备。”先生曾问我们：“诸位来美留学，当然是要学习救国的本领，你们有预定计划否？”

孙裕方同学说：“我的家族在上海创办了一个阜丰面粉厂，是用美国人做工程师。为了将来能够自己管理工厂，所以送我到美国来学习制造面粉的技术和管理业务。”

朱功甫同学答道：“张之洞在武昌设有纱、布、麻、丝四个制造局，为将来改进和管理各局的业务，特派我和我的同学张向仁到美国来学习纺织及染色等技术。”

我则答曰：“近年银价涨落无常，国际通商多感不便，英、美、日本等国都希望中国改革币制。美国政府去年曾派康乃尔大学教授精琪博士前往中国充任会商银价事宜专使，精氏建议中国应采用金汇兑本位币制（或译为“虚金本位”），张之洞反对币制“虚金”之说，特命我在美国专门研究有关币制问题。”

先生听到我们所要学习的专业，除当面嘉许外，又继续谈革命救国的思想与办法。他说：“梁启超主张必先立宪之后才能共和的谬论，是万万不可听从的爬行政策。”

此外，还谈了他当时的旅行计划，说他不日就要去欧洲，然后再去日本，做些宣传和联络工作。他准备好了一种对外宣传资料，是一本英文小册子，名叫《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书面上并有《中国革命潮》的中文译名。承先生惠赠我一册，拜读之后，非常兴奋。随即向先生说：“先生原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博士，世人曾以良医与良相并称。先生今日放下医人之术，专心从事医国。来日能将这一个‘东亚病夫’医治成为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功不可朽。”以上预言，曾几何时，真实现了。

二、反清思想的传播

溯自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后，清廷将康有为建议的维新法令全行撤销，恢复了“八股”文章考试旧制，我初次出来以“幼童”应试，被录取为襄阳府学第一名“秀才”。经“学台”王同愈（字填之）调往武昌经心书院肄业四年，我抛弃了旧式科举制度文学，专门学习鄂督张之洞所改订的“时务”课程，为派赴日本或欧美留学深造作准备。该时我放眼世界，忧心祖国，初步认识到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急剧衰弱，对外妥协，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断送了很多主权和领土，被各帝国主义者敲诈勒索去大量的特殊利益，已到了极为可悲的境地。

我看到种种媚外屈辱的事实，极感愤慨！课余时，常与同学辈聚谈国事，大家都有忧国忧民之心，但总谈不出救国救民的善策。我们经常看新出版的书报刊物，希望能找出报国的方略来。同学们都爱阅读梁启超在日本刊行的《新民丛报》，一则欢迎该报所传播的世界新知识，二则也爱阅读“中国之新民”等文章。该报中登有订阅若干份以上，报费可以打折扣的广告。同学们约集多人，由孔庚（字文轩）同学出名，订阅了数十份。该报即登载了武昌经心书院孔文轩为它的分销代理人。《新民丛报》是清廷禁阅的刊物，鄂省当局看到经心书院内竟有它的分销处，深为惊讶！随即将孔同学逮捕下狱。

一九〇三年三月，我赴美留学路过横滨时，停船两日夜，有数十位同学齐来欢迎我们到东京游玩一天。在欢迎会上，黄兴（字克强）、余德元（字明卿）、刘成禺（字禺生）、李书城（字筱植）等同学大谈排满革命的主张，这是我初次听到的

革命议论。抵美后，看到以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及其宣传刊物，在广东旅美华侨团体中颇为流行。其中有徐勤在旧金山所主编的《保皇报》，汤铭之在芝加哥所刊行的《中国维新报》，均大力传播保皇救国主张。继又看到由口来美的刘成禺老同学为兴中会主编的《大同日报》，宣传排满革命新思想。这两种中文报纸在旧金山大开论争，我都订阅，很感兴趣，内心颇为徘徊。经与孙中山先生在纽约聚游后，领受了先生的教益，不免引起我的思想斗争。乃反复检阅了万声扬（字武定）老同学自上海寄赠的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的许多反对满清政府的论文，和邹容在《革命军》小册子中所阐述的革命必要性等文件，适与孙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慷慨论述革命救国的理想大相吻合，使我茅塞顿开，认识到中山先生的革命救国理想，已浸入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的脑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自不难唤起民众，于短期内将此摇摇欲坠的满清皇朝一举而颠覆之，改建中华民国。从此我对于保皇派的言论知所摒弃，而对于革命的前途，益觉光明，仿佛看见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前景，一扫过去徬徨郁闷的心情。先生对于我的革命救国的启发教育，奠定了我日后归国，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思想行动的基础。

我读到在日本的江苏留学生编辑的《江苏》、浙江留学生编辑的《浙江潮》、湖南留学生编辑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湖北老同学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嗣改名《汉声》）等书刊，以及李书城同学所作的“学生之竞争”一篇社论后，更觉我们学生辈所负救国责任之至重且大。究应如何行动，不禁时萦心怀。未几想到，我虽隻身留学异国，亦应及时依照孙先生的计划，做些用书信宣传和联络的工作。鄂省当局连年选派我的旧同学前往欧洲及日本留学的有数百人，我应该分别写信和他

们联络，建议他们用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办法，向他们的亲友传播，促进他们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思想。我乃写信给在德、法、比、瑞士等国的同学友好魏宸组（字注东）、王鸿猷、黄大伟、李藩昌、贺子才、朱中和、秦国镛、雷炳焜、马德润、宾步程等，又写信给在日本的同学但焘、周维桢、李书城、程明超、程经明、冯升浚、屈德泽、李鑫、金华林、耿伯钊、陶凤集、朱绶光等，以及我的姑表兄刘仲文、姨表兄潘善伯等。转告他们关于孙逸仙先生到欧洲转赴日本，致力革命宣传联络工作的情况，并请他们转告他们的亲友聆听孙先生的革命议论。

不久，我接到数份印刷邮件，是留日同学程明超等寄来的。因我国内地闭塞，风气未开，他们特致书敬告家乡的父老伯叔兄弟姊妹们，长达数千言，详陈世界大势及中国的危机，这也可算是我向孙先生学来，转向他们宣传联络的结果。嗣后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活动中，上述大部分同学，都起了一定作用。

三、柏林虚惊

一九一〇年七月，我偕张柳池与朱公剑两同学由美归国，便游欧洲，道经柏林时，有几位湖北老同学曾向我谈及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旅居柏林期间，受到大多数留欧同学的热烈欢迎的情景。当时他们往来都甚亲密，俱有通力合作，早日回国，实行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心志。不料该时竟有鄂籍在德国留学的王发科与在法国留学的汤梦铭（汤化龙的胞弟）两人别具肺腑，忽然作了一次出人意外的政治偷窃行为，竟趁先生不在寓所时，相偕潜入室内，用刀子将中山先生的旅

行皮包割开，盗取了先生有关宣传革命的一些文件，献给清廷派驻柏林的公使馆，以求达到邀功讨赏的罪恶目的。幸而当时清廷驻德公使孙宝琦惧事涉已，拒不接受该项文件，并向王发科、汤萝铭两人说：“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我也不要看它。你们务必将它赶快送还原主人，不要多事。”王、汤两人将原件送还先生时，先生欣然受之。并且温慰有加，说了几句客气话，送他们出去。

四、武昌首义前的回忆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我由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船，回到上海。孙裕方、鲁易同学已于先一年回国，在阜丰面粉厂任厂长。他们请我到南京参观端方所创办之南洋劝业会。在该会办事的职员中，有一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归国之陈辉德（字光甫）告诉我说：“刘麻子（即刘禹生）已带他的美国老婆回来了，在汉口商业学堂任教务长。”我船到汉口，即前往商业学堂找刘，他问我数年以来在国外的情况。我们密谈了两天后，决定了两个方策：

第一方策，我已毕业回国，应留住武昌，在上层政府中多取联系，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服务。

第二方策，他的大学尚未读完，想以官费复回美国，继续其学业。同时为中山先生助理一切事宜。这两个方策，后来都得到实现的机会。

先说第一个方策。当时满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预备立宪。中央谘政院规定湖北省选举两名议绅，参加本省的督、抚、司、道会议。其产生议绅程序是：由省谘议局投票选举出加倍的人数（即四人），作为初选；然后由总督于初选的四人

中，固定两人，算是复选的当选人，为全省最高级代表，参加本省的上层政府，为督、抚、司、道会议厅的巡察员。刘禹生同学与湖北省咨议局的权要都有深交，乃向各方面代我吹嘘，以期将我选上。后经汤化龙议长提我是最适当的候选人之一，被总督瑞澂圈定而当选。另外一名是刘心源老先生。刘老在外服官多年，已告老回嘉鱼县原籍居住，不愿再“上衙门”。因之，我就算是督府会议厅中唯一的湖北省咨议局代表。

我初到汉口在商业学堂休息的几天中，刘禹生和我聚谈时，叫我以归国留学生身份到鄂总督府报到，并嘱我携带所拟就的《中国币制问题纲目》一百七十五题，向鄂督复命。昔年命我研究中国币制问题的鄂督张之洞已经去世。现任鄂督是旗人瑞澂，他接见我时，详阅了我的学历经过。我即将随带之文件面呈，并简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他略事翻阅后，乃命我写一篇上度支部改革币制书。当我应命写成交卷后，瑞澂就给我一个鄂省督府财政顾问官的头衔，并派我去北京晋謁度支部大臣载泽和币制局总裁盛宣怀，嘱我将所拟就的《中国币制问题纲目》咨送清廷中枢有关部门审核，并面陈币制改革的重要性及办法。待我由北京公毕归来复命时，适值南通张季直来鄂客居于总督府中。瑞澂命我作陪，同张一道前往参观纺纱厂。我在湖北省督府中有了两种重要关系，对于我们实现预定的第一个方策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再说第二个方策。刘禹生与我均为湖北学台王同愈的“得意门生”。彼此又为武昌同住书院的好友。一九〇四年，刘由东京转赴美国自费留学时，曾在《大同日报》（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所办）任总主笔。他是与保皇党机关报在救国方略上斗争多年的老战士。他因老母在汉口居住，特携其美国夫人同归省亲，暂任商业学堂教职，以补助生活。他见我归来，大喜，想

补我的官费遗缺，俾能返美复学。于是我邀他一同采访湖北藩司的高凌霄（曾任经心书院提调）字泽畲老师，和湖北汉阳府知府陈树屏（字介庵）老师，请他们两位找湖北提学使王寿彭向瑞澂呈请：“拟以刘禹生补陶德琨留美官费遗缺，并以陶德琨接任汉口商业学堂教务长的职位”。经瑞澂一一批准后，刘禹生乃领得路费，复到美国，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学，同时，帮助孙中山先生办事，这是第二方策之实现。

刘禹生返美复学后，曾数次给我来信，谈及与中山先生联络的情况。某一天，他很高兴地来函报告说：他正为先生翻译一封黄克强自香港打来要求汇款接济的密电，尚未及复。还说，他随侍先生到餐馆吃饭，忽然看见该日报纸上用大字登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先生和他于大喜过望之余，即速筹路费，收拾行装，搭船回国。

我的姑表兄刘仲文，在日本留学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出巨款资助先生创立《民报》以鼓吹革命，曾被选为同盟会第三任总理。一九〇九年，他在明治大学毕业后，经东京总部推举回国，主持在武汉进行的革命活动，计划有关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我归国以前，他已经设立秘密机关多处，为联络军学各界同志之所。先在武昌城内雄楚楼租得一栋大房子，用他叔父刘子灵度支部郎中的官衔，书写刘公馆的大红纸条张贴于大门口，借以掩护他在屋内的机密工作。复在汉口俄租界汉兴里租一栋楼房，作为他自己的住所。还商请他的忠实同志邓玉麟（字品三），在武昌城内的军营附近，黄土坡下边，开设了一个同兴酒楼，专为军界诸同志往来招待之需。仲文表兄见我归国，定居省垣，高兴异常，连日和我共商大计。他因事务繁忙，特命其胞弟刘同（字敦众，原名刘耀漳字敦众）和我的姨表兄潘善伯随时与我联络。因之我常与

老同志孙武（字光卿）等在一起做些地下工作。仲文表兄数次向我谈及活动情况时，对各秘密机关费用逐渐增多有顾虑，遂同我商筹经费接济的问题。我答以年关逼近，容在新年之后想办法。

我八年在外，未回过家。就这年春节请假省亲之便，借到姑母处拜年的机会，向姑父打打经济主意。姑父刘子敬先生为武秀才，爱驰马试剑在家中教了一堂武学。他继承其父刘荣达（字尊三）的遗产甚丰，可算是襄阳县的一个大富翁。但是，他对于钱财不厌其多，总乐于和人谈致富之术。我于幼年时，在诸表兄弟中早已被他认为是一个最可爱的孩子，见了面总是喜欢和我谈话。我也最能了解这位老人的性格。此次相隔十年的重聚，以我初自新大陆留学归来，他便更乐于同我叙谈，了解欧美各国的种种情况，以及国内若干问题，此外，还谈到他对子女后辈的展望等等，似乎向我有所商讨。我当然避而不谈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只投其所好谈些“升官发财”的方法。我曾嘻戏地曲为解释《四书》上所谓“生财有大道”的学说，谓：满清政府坏到极点，尽量设法吸取人民的财富，规定人民可以拿钱买官做，做了官就可以发大财。官做得越大，财可以发得越多。能有一个“道台”头衔，就能够得上“大人”的称呼，什么大差事都可能当得上。当大差事，就可以发更大的财。所以“生财有大道”之说，总算是合乎现时中国社会的趋向了。我两人不禁因之大笑一场。我乃趁此机会进言：“仲文表兄有日本大学毕业的资格，你老人家若肯拿出两万银子来给他捐一个“道台”头衔，自不难令他飞黄腾达，步入青云直上之路。我明知姑丈虽然有钱，但是他的钱总不肯轻易拿出来的。诟料他听了这一席话，竟慨然应允，不日即将纹银两万两汇至汉口，交我代办一切手续。仲文表兄在背后大笑特

笑，欢喜地向我说：表弟这一段绝妙词令，居然将老头子的思想彻底打通了。不数日后，仲文表兄即与我偕行，到了汉口，将银子取得，拿去半数交给同志应付各项用途。下余的一万两银子，交我代为保存。直至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李烈钧、欧阳武发出讨袁世凯的通电，发生“湖口之役”时，仲文表兄始将该款提出，用作进行第二次革命之需。

五、辛亥武昌首义概况

刘仲文表兄拿到一万两银子，将他联系的武汉的各秘密机关和各同志等应支付的费用，一一作了安排后，即放手进行各项革命准备工作。时光易逝，春夏两季顺利地渡过去了。交秋以后，因人多口杂，有些秘密情况外露。该时，清廷谕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路过武昌，将鄂省的新军调了一部分随带入川。革命党人就趁此武汉空虚的机会，急谋发动起义。原决定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发动，不料这个秘密消息被汉口某报披露出来，清廷随即严加戒备，未能如期举行。一两日后，忽然发生意外。孙尧卿同志在汉口汉兴里刘仲文寓所内与仲文胞弟刘同试装炸弹，不慎爆炸，浓烟冒出屋顶，被俄租界的巡捕看见，立即进屋追查。孙尧卿同志因面部被炸出血，经刘仲文和另一同志抢救，用衣包头，由后门逃出，送往医院。刘同被捕，室内所有的文件，旗帜、名册等等通被搜出，送交夏口厅，转呈督署。清督瑞澂获此要案，当即电奏清廷。同时下令，按照所获名册搜捕党人。顿时人心惶惶，谣言纷起。八月十八日夜，大批军队将武昌城内小朝街的两所学生宿舍围抄，并捕去学生数十名。我的六弟陶德璋（字玉璞）和我的学生王可伯、朱介之等人也被捕去。十九日凌晨，天尚未明，忽

有学生数人来我处，催我赶快起床，设法营救被捕同学。我同他们商议后，于晨六时左右赶赴学务公所，找提学使王寿彭。王不在署，我又赴度支公所，找藩台连甲。藩台也不在所。我乃转赴督院。甫至辕门口外，即见有军队多人，架着机关枪，如临大敌。我因系府中职员，得以随便进去。先到总文案处，室内竟寂无一人。我只好往会议厅去察看。会议厅在西花园内，原为督、抚、司、道会议之所，我是常去的。不料该时正门紧闭，有武士多人持枪守卫，不准开门。我乃由走廊绕至花园后门，进入会议厅内。厅为五大间，环坐了十几人，均是省中的权要。除瑞澂外，所有司、道等大员，均静坐在内。见我来到，他们都只向我微微点头，不象往日开会时热情接谈。厅的正中前半，用板隔断，外间坐有督练公所的总办旗人铁忠，及武昌府的知府旗人双寿，正在开庭问案。所审问的，就是被捕的革命党人。由大厅窗户外望，看见厅旁所拴的许多学生中，我的六弟玉璞及姑表弟刘敦众均在其内。厅中东窗下，坐有高凌霄（字泽畬）（他原是藩台，因丁艰，开缺，由旗人连甲继任藩司，他则改充督院的总文案）。我与高有十多年的师生关系，感情甚好，乃趋坐其旁，低声告诉他说：我有舍弟和学生数人被捕，请教他应该用如何营救的手续？他当即细声对我说：此案正在审讯中，待审讯完毕，看案情如何，始能决定营救的办法。

当日未及半夜，即闻城外有大炮的响声。继见城内有一处冒起了火光。我知道这正是预定的计划，即城外一有炮声，城内当即举火为号以应之。未几，即闻有稀落的枪声。约在半夜左右，即有一批一批的军队，经过我的大门口，拖着大炮，轰轰隆隆地由黄土坡上往下直奔，并大声叫喊：“拖到阅马场、上蛇山，向制台衙门开炮！”我的住所距阅马场不过千百步，我

楼上卧室的东南西面窗户，都对若蛇山。天放微光时，已望见蛇山上竖着十八团的革命大旗，并听到向总督府开炮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但却未闻有排枪对射的声音，我当判明敌人未必能作出有组织的抵抗。天大亮，街上安静如常。我就认为必无扰民的行动。但攻击儿处旗籍大官的公馆，乃势所必至。我闭户和家人多烧开水，准备在大门外置茶水缸一口，为军界同志们作解渴之用。候至中午，未见到有来我处报告消息的人。午饭后，我不耐久候，乃约在我家寄居的亲友邱国翰（字屏州）、冯开浚（字哲夫），傅立相（字玉阶）等，各于左膀扎上白布，出外由黄土坡下走向阅马场，到谘议局去看看情况。谘议局内外聚集的军民甚多，现场忙乱，我们未找到一个熟识的人，但见局内贴了“临时制旗组”牌子的一个大房间内，约有百数十个裁缝正在赶做十八团的革命旗帜。谘议局大门外张贴了一纸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安民布告第一号。布告上未行写着：“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我当时即断定是清督瑞澂及统制张彪等军政大员，都被炮火轰走了，或者是被打死了，所以毫无抵抗。武昌城已成为中华民国之发祥地。我便回家静候捷报。

次日下午，刘仲文表兄始匆了来到我家，历述他推进革命运动的经过，以及近几天中武汉地区的实际情况。他说，早在东京预备回国时，曾推他为湖北都督。他认为都督一职，应找一位有军事知识而又有实力的湖北军人为宜。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为最适当。因黎带领有军队而且甚得军心。所以他和同仁等推举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并已用黎的头衔张贴安民布告，而他只居于总监察地位，以监察黎的任职行动。又说：惟以兹事体大，原拟定于阴历十月，七省同时起义，因情势变化，事机危迫，若不迅速发动，就只